

法制文萃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196 国内邮发代号:1-163
每周五出版 零售价:6元 全年订价:3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 法制日报社主办 法制文萃报编辑部出版

2025年7月31日 总第2866期 本期8版

入选农家书屋推荐目录唯一法治类报纸

陈凯与中华遗嘱库

4版

2013年,中华遗嘱库公益项目正式启动。然而,项目初期却遭遇“谈遗嘱色变”的社会心理壁垒。“很多人一听立遗嘱,扭头就走,甚至怀疑我们是骗子。”陈凯说



前男友把她“卖”给了十万人

5版

众多女性未曾察觉,自己的隐私正被隐藏的镜头捕获。被偷拍的女性大多数不知情,即便有一些知情的,也并不知晓自己的隐私会被发布到公开网络

“话费慢充”背后的黑色链条

7版

“内部员工充话费,享78折优惠!”“72小时内到账,500元话费只需400元。”这种话费慢充服务看似送到了羊毛,殊不知已经沦为了他人“洗钱”的“帮凶”

《四世同堂》手稿背后的传奇故事

8版

《四世同堂》写出了时代变革中平凡小人物的光芒与幽微。按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是对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其手稿背后的传奇故事,亦令人唏嘘

近年来,互联网大厂员工的腐败问题,已经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腾讯、京东、阿里巴巴、抖音、美团等企业持续开展“反腐反舞弊”行动

腐败案件频发

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破获互联网大厂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其中,饿了么前高管韩某等3人,在两年内涉嫌收受供应商的贿赂高达4000余万元。上海警方通报显示,2023年7月以来,饿了么前高管韩某等3人利用手中管理物流配送业务等职权,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收取供应商刘某等4人的行贿款,甚至要求根据对方利润情况按比例分成。在两年的时间里,韩某等3人30余次收受供应商行贿款物达4000余万元。韩某等人收受贿赂的手法极为隐蔽,为掩人耳目,还将赃款赃物分散存放于多处租赁住房内。目前,韩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腐败问题,早已引发社会关注,也不断有相关案例曝光。7月9日,唯品会内部发布反腐通报称,产品技术中心基础平台运维总监马某,长期收取供应商好处费,涉嫌职务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此之前,唯品会副总裁冯佳路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正配合警方调查;7月2日,哔哩哔哩(B站)通报称,原游戏合作部总经理张某某,存在严重职务犯罪行为,已被逮捕。除了企业管理层,采购、运营、审批等一线业务岗位也成为腐败频发地带。涉案员工往往掌握部分资源管理和审核权限,利用商家入驻签约、业务评级等职权,为他人提供便利并非法获利,甚至出现“小官巨贪”的情况。

今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披露,某短视频平台公司服务商与区域运营部门负责人冯某负责服务商的入驻



韩某案中查获的赃款。上海警方供图

互联网大厂“反腐记”

审批、奖励政策制定及执行等工作。这个职位不算特别高,但该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吸引流量,经常出台各类鼓励服务商入驻和运营开展活动的补贴政策,冯某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他与外部供应商唐某、杨某等共谋,在制定奖励金政策的时候留下程序漏洞,并且将内部数据泄露给外部。这样,外部商户在没有真实运营的情况下通过提交内部数据,就可以将他人的奖励金划归己有。为了方便骗取奖励金,杨某还指使其下属王某、赵某甲、赵某乙、翟某以本人或他人名义注册多家“空壳公司”,协助将某短视频平台公司支付的奖励金转至杨某实际控制的账户,共计1.4亿余元。

某互联网企业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互联网企业经营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数据、代码、流量等都能带来收益,也容易成为内部人员贪腐的风险区域。从近年来披露的案件来看,互联网企业贪腐犯罪呈现出“三多三大”特点:大厂犯罪多、一线职能部门犯罪多、青年和中层人员数量多;非国家人员受贿案占比大、“数额巨大”案件占比大、职务侵占犯

罪金额大。

涉案企业普遍存在制度性缺陷

以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近年来贪腐案件频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制度建设不完善,给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上海一位检察官表示,辖区内一家新兴互联网企业频频因内部人员贪腐问题被立案。检察机关深入调查后发现,该企业的内部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没有对关键岗位人员进行监督和复查,“漏得像筛子一样”。这就意味着,单靠查处个案无法从源头上阻止贪腐行为的发生。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曾梳理该院3年间办理的所有民营企业经营与内部舞弊刑事案件,发现涉案企业普遍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一是监事会管理规范化程度不足,流于形式,造成企业结构失衡,内部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二是法务监督欠缺法律与实践保障,在公司营利目的驱动经营的特定思维路径下,法务部门防控法律风险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三是审计监督不充分,民营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隶属于财会部门或由总经理

负责管理,受限较多无独立地位,外部审计仅把财务报表的合法公允作为评价标准,很难起到监督公司财务的作用。

互联网企业陆续成立监察部门

多家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士对“大厂贪腐”现象感到担忧。“企业反腐不仅是风控问题,更是企业的生死线。”新浪公司法务部法务经理高嵩结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说,中、基层员工直接接触客户和供应商,掌握具体操作细节,而管理者难以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信息不对称问题格外突出,贪腐行为难以察觉。

为加强企业内部的反腐败、反舞弊,一些互联网企业陆续成立监察调查部门。作为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阿里巴巴2012年就设立了“廉正合规部”调查内部腐败问题。马云曾说:“阿里所有人,廉正合规部都可以查,包括我在内。”此外,腾讯设立了反舞弊调查部,字节跳动设立了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有“重案六组”、百度有职业道德委员会,京东有内控合规部等。刘强东曾表示:“你敢贪公司1万块钱,我就宁愿花100万、花1000

■ 实话直说

互联网行业的反腐风暴愈演愈烈,暴露出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治理困境。此前,互联网行业处在高速扩张期,尤其是一些头部“大厂”,规模和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从企业高管到一线员工,有人掌握着从供应商选择到流量分配的全方位职权。权力一旦集中,在缺乏有效监督制衡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当前,各大互联网企业普遍成立了专门的监察调查部门,并且频频掀起“反贪风暴”。更重要的是,要超越风暴式、运动式治理,形成制度性的反腐机制。例如,针对掌握审批权限的重点岗位,进行重点监督,从权力制衡机制设计、审批流程优化、跨部门监督体系完善等多维度切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外,针对因技术门槛导致的隐蔽性贪腐,可以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对各个审批节点进行监督和“留痕”,提升决策的透明度。企业之间也可以加强信息共享,协同构建廉洁的商业生态。

(本版有删节。原题为《多家互联网大厂高管“落马”,严查之前要有严防的反腐机制》)

□ 熊志
红星新闻 7月27日

万去调查你。”

互联网大厂该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防范商业腐败风险体制?北京市海淀区的检察官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建议:例如遵守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对高风险岗位实现监督制约;又如,在“6·18”这种易发高发商业腐败新场景来临时,企业要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

□ 赵映曠
上游新闻 7月27日

六问:未来政策如何继续发力?

方案明确,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评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完善政策措施。

余宇认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国家育儿补贴制度为今后整合各种补贴形式、逐步提高补贴水平、与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扩大的协同推进,同时也为建立覆盖儿童成长全周期的综合性育儿补贴制度,预留充足的政策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杨凡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应不断优化育儿补贴政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使其在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李恒
《新华每日电讯》7月29日

从今年1月1日起,每孩每年发放育儿补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7月28日公布。这是一项全国性的重要民生政策,面向育儿家庭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发放现金补贴,有助于缓解家庭养育压力。

哪些家庭可以申领育儿补贴?补贴标准为何如此设定?地方已有补贴政策怎样衔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对热点问题作出解读。

一问:哪些家庭可领取育儿补贴?

根据方案,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换言之,无论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育儿补贴。

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可享受政策,按应补月数折算发补。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一孩、二孩、三孩均可领取补贴,且标准相同,实现了三孩生育政策下家庭支持的全面覆盖,体现了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平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姜全保认为,一孩生育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将一孩也纳入补贴范畴,能一定程度帮助缓解年轻夫妇的生育顾虑。

二问:育儿补贴怎样申领?

方案明确,育儿补贴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主要通过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请,也可线下申请,各省份结合实际确定具体发放时间。

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各项准备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本波表示,通过直达家庭的普惠性现金补贴,可以直接增加育儿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提高获得感。

三问:补贴标准如何设定?

根据方案,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中央财政按比例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予以补助。地方可根据财力适当提标,提标部分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朱坤分

析,发达国家的育儿补贴标准各不相同,总体上看,每孩每年获得的补贴占该国人均GDP的比例通常在2.4%到7.2%之间。参考国际经验,我国育儿补贴标准占人均GDP的比例相对比较合理。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育儿补贴政策方能行稳致远。”朱坤说。

四问:地方已有补贴政策如何衔接?

方案要求各省份做好衔接规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人文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余宇介绍,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育儿补贴相关政策,亟待国家层面出台基础育儿补贴政策予以规范、指导和统筹。

姜全保说,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发展特点,在财力允许范围内补充出台差异化补贴政策。通过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生育支持政策。

五问:育儿补贴预计有什么效果?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1号
邮编:100102
广告发行:010-84772978
●本报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学辉
电话:13701097156

●责任编辑:郑剑峰 王勇 版式设计:李海英